第一章

导论：国际政治学的形成与发展

国际政治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先在西方，而后逐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一门新兴社会科学学科。它既是政治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学科，又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领域和方法；它与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具有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特点。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国际政治学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第一节　国际政治学及其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什么是国际政治学

国际政治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是揭示国际社会中各种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

一般说来，政治学包括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政党和政治团体、行政管理、外交学和国际政治等分支学科，每个分支各有其特定的内容，相互之间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国际政治学的特定内容就是揭示国际社会中的各种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和这种政治关系发展变化的一般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律，而不是研究一国之内的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如果说，国际政治学和政治学是一种种属关系的话，那么，国际政治学和其他分支则是一种平行关系，它们之间既有领域划分的不同，又有相互之间的渗透。

在国内外学术界，人们通常把国际政治学等同于国际关系学，它既有国际政治关系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或集中表现的含意，也确实反映了以往国际关系以政治关系为主的实际情况。随着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发展，经济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日益显得突出，占有重要的位置，具有丰富的内容，它有时通过政治关系表现出来，有时也不一定都表现为政治关系。由于国际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关系，所以，也有人把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区分开来。

在中国，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广义地理解包含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史和当代国际政治问题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其中国际关系理论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国际关系理论之分；国际关系史有近代、现代和当代之分；国际政治问题主要指当代全球的、洲际之间的、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政治问题。这三者既有各自特定的内容，又有相互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综合起来，构成国际政治学的基本内容。国际政治离不开各个国家的利益，各国的外交是实现各自国家利益的手段和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讲，各国外交政策问题也成了国际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国有关国际政治的著作和教材，也都把各国的外交政策列入其中。狭义地理解，国际政治学即指有关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学说。我们把国际政治学看做是揭示国际社会中各种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政治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的新兴学科，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当然，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战略学、国际经济学、国际法学、外交学等学科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交叉性、边缘性，这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关于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国内外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是世界体系，有的认为是国际社会，有的认为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政治关系，还有的认为是主权国家。我们认为，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国际社会中各个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

国际社会是一定历史时期内各个人类共同体或国家间相互交往关系的总和，它是国际政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作为国际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国际社会，应该强调指出，不是一般的国际社会，而是国际政治社会，即国际社会内各

构成要素或各种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交往关系的总和。它包括：国际政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前提，国际政治社会的一般特征，国际政治社会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构状态，国际政治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等等。

国际政治行为主体是国际政治社会中最主要的构成要素，包括国家行为主体，即主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即国际组织、跨国政党、跨国公司等等。它们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最主要对象。传统的国际政治学理论，把主权国家视为惟一的国际行为主体，只研究主权国家，完全忽视对非国家行为主体的研究。国际政治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随着国家间关系的日益密切和国家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加深，非国家行为主体不仅在数量上有了急剧的增加，而且在国际政治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国际政治学与一般政治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对主权国家和各种非国家要素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它们的对外政策、对外行为和对外关系，而不是它们内部的运行和发展；研究它们与其他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研究它们在国际政治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把它们放在整个国际政治社会的大环境中，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和发展所起的作用。

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军事关系、外交关系、法律关系、文化关系、历史关系等等诸多方面。作为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我们强调的主要是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它主要涉及：各国对外政策及其发展演变，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的发展变化，国家集团的形成、分化和改组，世界秩序的形成、发展与变革，等等。当然，政治关系与其他各种关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特别是经济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影响和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军事关系和外交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关系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研究其他各种关系，并不是研究其他各种关系本身，而是围绕政治关系这个中心，研究其他各种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影响和作用，以及其受政治关系影响的方式、程度。

国际社会各构成要素之间政治关系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既是一个很抽象、又是一个很具体的范畴。所谓抽象，是指国际政治学所要探寻的是“一般”发展规律，它应当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不是只适用某个特定的国家、地区或国家类型，而是适用于整个国际政治社会；所谓具体，因为一般规律总是各种具体的现象、各种特定的规律的抽象或理论化，是建立在对各种具体现象和问题的研究和概括的基础之上的。恩格斯在 1890 年 9 月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

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① 我们研究国际政治的一般规律，必须首先把握不同历史时期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特点，其次要全面分析国际政治主体相互关系的结构状态，再次要了解各类国家相互关系的基本特征，最后要分析各种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总揽全局，分清主次，把握国际政治的发展动力，揭示国际政治的发展规律。

上述国际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四层内容，即国际社会、行为主体、政治关系和一般规律，彼此并不是孤立无关的，而是紧密相连的一个整体。国际社会是一个大的系统和总体环境，行为主体是研究的逻辑起点，政治关系是研究的主要内容，探寻一般规律是研究的主要目的。

三、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方法论的问题对于一个学科、尤其是新兴学科来说，至关重要。西方的某些学者认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算不上是一门完整科学，其主要理由就是它不具有科学的方法论。60 年代西方出现的“行为主义革命”，其主要目的就在于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研究确立一整套的“纯科学”的方法论。目前，在西方和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新方法被普遍采用，同时，传统的方法，即历史研究、个案研究以及法理研究仍占重要地位，这为我们研究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们面临着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科的艰巨任务，确立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前提和基础。在方法论问题上，我们认为，必须解决好下述几个重要问题：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 版，第 4 卷，69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 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国际政治学是一门新学科，我们在过去对其进行理论研究不够，西方的研究则起步较早，影响较大，有些西方学者还有意无意地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关于国际政治的丰富内容，这就需要我们更自觉地注意这一点。这门学科涉及面广，问题复杂尖锐，直接关系到国家利益和人类进步，对我国来说，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和平与发展的对外政策总目标的实现，从国际范围来说，直接关系到维护世界正义和实现持久和平、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这个既充满矛盾斗争、又离不开相互依存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更不能须臾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当然，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绝不是搞教条主义，简单地背诵和搬用现成的结论，而是要紧密地结合国际社会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新情况，分析新问题，得出新见解。也就是说，我们既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要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① 报告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②这对我们研究国际政治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无疑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2.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它消除了以往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即只考察人们历史活动的动机，而不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规律的根源；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所有各种矛盾的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准确测定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的条件，排除了选择某种

① ②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3～4、1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主导’思想或解释这种思想时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不同趋向的根源。”①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系统论的方法，这在目前已经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和采用，它包括：（1）整体性原则，即要求把研究的对象纳入它所属的整体，从整体上来认识和对待。（2）相互联系性原则，即强调整体内的各部分、各要素相互之间的密切联系。（3）有序性原则，即整体内部各部分、各要素的联系是有一定的结构和规律的。（4）动态性原则，即整体、部分、要素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绝非静止不变的。（5）定量化原则，即它们的运动变化都可以用一定的数量表现出来。系统论的方法对研究国际问题确实是适用的，是很有价值的，但归根到底，我们还是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即从国际社会的实际出发，去研究它的发展变化，也就是既要弄清国际社会的构成、各种力量的对比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要分析引起变化的动因、发生变化的条件、具体变化的表现以及变化的趋势和规律等。系统论的方法和唯物辩证法是一致的，或者说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

在研究国际政治学中坚持唯物辩证法，尤其要注意两点：一是正确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国际政治的研究中，阶级分析的方法并未完全过时，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所决定的。但是又不能把阶级分析简单化、绝对化。这是因为国际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阶级关系。一般说来，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主体，它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除了代表本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外，它也代表整个国家、全民族的利益。同时，还要把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因为某个阶级或它的代表人物，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还会有不同的表现，决不能只看到阶级属性这一点，就简单地作结论，那是注定要脱离实际，甚至闹出笑话的。二是要正确地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既要坚持归根到底经济因素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科学论点，又不能忽视“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的反作用。这两方面本来就是有机地联结在一起的，我们应该如实地把它统一起来，这也就是辩证法讲的对立的统一。可以这样说，只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就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3. 坚持政治与经济有机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方法

国际政治学虽然研究的主要是国际政治关系，但是政治与经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始终具有重要地位。

① 《列宁选集》，3 版，第 2 卷，42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重商主义是最早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国际问题的理论学派，在政治哲学上，重商主义者信奉的是修昔底德、马基雅弗利、霍布斯等人的“自然状态”学说和霸权理论，即认为国际社会处于一种彼此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一方之所失必为另一方之所得”的“零一和”博弈。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一个国家要想改变或改善自己的权力地位，“就只有掠夺别国的财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商主义又被称为“经济民族主义”、“经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一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盛行的时期，正是欧洲各个新兴国家加紧扩张财富、人口和领土的时代，这就决定了重商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要“将一切经济活动都从属于国家对权力的追求”，即在重商主义者看来，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就在于政治决定经济。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重商主义学说进行了批判，认为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十分重要，但是国家乃至国际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制度，特别是市场则更为重要。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并非国家的政治权力，而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1）在政治哲学上信奉约翰·洛克的政治自由主义，即在由其本身规律支配下的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为了保障社会秩序和个人之天赋权利，人们根据某种契约而设立了政府，并赋予其制定法律的权力。但是，政府的作用仅限于保障人们的生活、自由和财产权利。(2)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体不是国家，而是个人，即代表的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3)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或理论基础是“自由放任”，即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强调经济因素，特别是市场对国家政治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国家之政治职能是为个人的经济利益服务的。（4）国家间的关系并不一定都是一种“零一和博弈”，而可能是一种“非零一和博弈”，即所有有关国家都可能从相互交往中获得收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有机结合的产物。重商主义强调政治决定经济，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经济决定政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将其贯彻于对国际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分析，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出发，把政治经济学既作为一门对社会关系进行抽象的理论学科，又把它作为“一门历史的科学”① 他们从资本主义时代最一般的经济范畴——商品入手，以劳动价值论为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489页，人民出版社，1995

基础，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背后所隐含的各种政治、经济及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① 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②。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国际政治问题，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理论财富。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我们研究国际政治经济理论的重要指导。③

4．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立场

国际政治学是一门科学，但它决不是所谓的“纯粹”科学，各个国家的国际政治学总是为各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总是深深地打着各个国家的烙印。例如美国的国际政治学理论，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以至现今的新现实主义，都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为他们制定对外战略效劳，或为他们的对外政策辩护的。前苏联的国际政治学理论一度鼓吹过的“国际专政”论、“有限主权”论等错误理论，也是如此。我们研究国际政治学，也要有鲜明的立场。我们对待国际问题的立场就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立场。我们研究国际政治学就要始终贯彻这种精神，这也将是我们谋求创建的中国国际政治学的一个特色。爱国主义在当前的集中表现就是要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实现祖国的统一，使我国强大繁荣起来，使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能过上幸福、富裕的物质生活和健康、文明的精神生活，并且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为人类作出积极的贡献。国际主义在当前的集中表现就是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进行不懈的努力。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讲国际主义较多，还做了一些我们力所难及或超过我们负荷能力的事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吸取了教训。近年来，我们强调建设好我们的国家，这本身就是重大的国际贡献，但有些人又完全忽视了我们还应尽力所能及的国际义务，这也是应该注意的。我们一定要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立场，正确处理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143～14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 版，第 3 卷，492 页

③ 关于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理论，参见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第 1 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5. 学习和借鉴人类宝贵的国际政治方法论遗产

国外的国际政治学起步较早，尽管其国际政治学理论中的许多观点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但是它的发展同样也是人类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长期历史演进的结果。在方法论上，西方比较早地将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和经济科学的方法引入国际政治学研究，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西方学者在研究国际政治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方法，有所谓传统的方法、行为主义的方法、后行为主义的方法，或称之为方法论上的革命。我们对此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也不能盲目地全盘肯定，而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吸取其有用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扬弃其无用的方法、错误的方法。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中，有六种方法和研究路径是值得借鉴的：

（1）国际政治系统论。50年代后期，随着系统论被引入政治学研究，国际政治学家开始运用系统论来研究国际政治问题，特别是研究国际政治社会和国际政治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变革。最早的研究范例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莫顿·卡普兰于1957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一书。① 他在书中提出了六个国际系统模型，即均势系统、松散的两极系统、紧密的两极系统、普世的国际系统、等级制国际系统、单位否决的国际系统。卡普兰的六个国际系统模型有许多可进行商榷的地方，但其可贵之处在于对科学方法论的追求。按照卡普兰的说法，他“在各个国际政治系统模型中所运用的许多假说，旨在说明在系统保持平衡时赋予系统以特征的行动类型，而非预测任何个别国家行动将具有如此之特征”② 他所设定的六种国际系统模型，只是“启发式的模型”③，目的是要探讨作为“行动系统”的国际政治系统或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其内在的行为主体有哪些，彼此间的行为是如何相互作用、如何推动国际系统的变革的。作为一个“行动系统”，国际政治系统是动态的；其构成要素——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系统与行为主体之间、不同的行为主体之间是以某种方式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国际系统的稳定和变化取决于一系列变量，如系统的基本规则、转化规则、行为主体分类变量、权力变量、信息变量等等。

（2）国际政治沟通论。又被有的人称之为“通讯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是60年代以后科学行为主义方法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卡尔·多伊奇。沟通论源于控制论，卡尔·多伊奇将其引入政治学

① 参见［美］莫顿·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

② 同上书，1页

③同上书，21页

和国际政治学研究中，即强调政治系统与其他诸系统一样，是一个借信息的获取、传送、处理、利用而实现维持、变化和控制的过程。在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中，国家的决策和对外行为往往取决于沟通的形成、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我控制能力。不同的沟通方式、沟通和交易渠道，往往造成国家间关系的不同模式和状态。多伊奇将其概括为“混合政治共同体”或“多元安全共同体”两种基本类型。① 80 年代以后，许多学者又运用沟通理论来研究欧洲一体化问题。

（3）博弈论。博弈论（g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原是一种数学的运筹学方法，20 世纪 40 年代被应用到经济学中，用来分析经济和贸易竞争。 50 年代以后博弈论被广泛应用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最常见的国际政治博弈论模型有“小鸡游戏”（the game of chicken）、“囚犯的困境”（prisoners' dilemma）、“针对不平等的威胁对策” （threat games against inequality）和“协调博弈” （coordination game）等等。其中又分为“零—和”或“定数一和” （zero-sum or fixed-sum）、“非零一和’或‘变量一和”（non-zero-sum or variable-sum）、“两方”（two-player game）和“多方”（N-player game）的博弈模型。

在西方研究国际问题的大多数学者看来，博弈论模型能够为他们提供一种借以分析国家间安全问题和经济问题的理论方法。这种理论方法的假定前提是从事国际间博弈的都是理性的行为者，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并且都面临一种通过不同的行为方式就可能造成不同的成本和收益的既定报偿结构或环境。最初，人们主要借助于“小鸡游戏”和“囚犯的困境”来分析国家间双边安全和经济关系。后来，一些学者又用“针对不平等的威胁对策”和“协调博弈”来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间的多边政治经济关系问题。

传统的博弈论强调国家间冲突的本质，以“零一和博弈”为基本研究模式。新现实主义者则强调“非零一和博弈”，即国家间的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并不是“我之所失必为你之所得”的“零一和”结局，而是双方或多方都可以从中获得收益。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国家间的合作的可能性，而不是竞争与对抗问题上。他们对国家间相互交易及其结果的分析不是停留在一次博弈上，而是强调多层面的、多轮次的博弈对国家交易行为的影响。例如，甲乙双方可能会因为某种特殊事件或一方的错误决策而形成对抗，但是在经过多轮博弈之后，双方或各方经过反复权衡和彼此协调就会实现合作，至少是缓和对抗。

国际政治经济博弈论对国际合作的研究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假定的基础上

① 参见［美］卡尔·多伊奇：《政府的神经》（Karl Deutsch: The Nerves of Government），纽约，自由出版社，1966；《国际关系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的，即国家是统一而理性的行为主体，国际间的博弈是由国家居主导地位的。这就受到来自跨国主义研究的学者的挑战，因为国家间博弈的模型无法说明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协调与合作中的作用。同时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博弈论模型对国家间交易行为的分析过于理想化了，国际政治经济的现实是很难以这种被简化了的数学模型来完全证明的。

（4）国际合作机制论。国际合作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是 80 年代以后在西方国际问题研究中非常流行的一种新的研究模式，也是在西方颇有争论的一种理论模式。最早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提出“国际合作机制”概念的是约翰·鲁杰，他把国际合作机制定义为已经被一部分国家所接受的一系列相互期望、规则和规定、计划、组织的能量和财政义务。此后，唐纳德·普哈拉和雷蒙德·霍普金斯从行为方式的角度对合作机制进行了界定，认为，国际关系所及的每一个问题领域都存在某种合作机制，只要存在行为的规范性，就必然存在适用于这种合作机制的某些原则、准则或规则。同时，“合作机制”的术语又纯粹是一种用以对国家在特定问题领域的行为进行归类的描述性方法。克拉斯纳是从隐含的或明确的共同规范和期望来给合作机制下定义的。奥兰·扬和维诺德·阿加瓦尔则是从明确的责戒来对合作机制进行定义，将合作机制定义为旨在规范国家在某个问题领域内的行为的国家间的多边协议。一方面，合作机制所表明的是一系列由明确的责戒所规定的国家可以采取的行为；另一方面又在于解释合作的因果性或构成性的变量。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则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定义合作机制。

国际合作机制模式所重点研究和分析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合作问题，特别是国际合作的组织形式、规则和规范以及国际合作的结构功能问题。尽管人们对什么是国际合作机制以及合作机制的基本类型、特征存在诸多歧义，但是持这种分析方法的学者普遍认为，国际政治经济中并不只有对抗，而且存在着国际合作的广阔前景。随着国际相互依赖关系的不断加深，合作已经取代冲突而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主流。当然，他们对国际合作的研究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的。有的从“霸权稳定”或“霸权后合作”的角度，围绕霸权的兴衰来讨论国际合作；有的从博弈论和对外政治经济战略的角度来探讨合作机制；有的是从结构功能主义的层面来分析国际组织的作用；还有的是从“认识论”或意识形态的方面来进行研究。从国际合作机制模式的角度对国际合作进行研究的最常用范例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

对这种方法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这种方法的最大弊端就是忽视了各个国家内部政治过程和经济状况对国际合作的影响。此外，这种模式带有浓厚的发达国家的偏见，即只有依赖于发达国家才有可能实现世界范围的国际合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5）公共选择范式。公共选择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方法”，主要是运用现代的或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政治过程和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新现实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公共选择范式主要是通过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对政治过程和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它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对政治制度的运作和政府、政党、投票者、利益集团、官僚的行为进行明晰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寻求从规范的角度建立一种更理想、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它的主要特征包括：将个人作为分析的主要单位层次，个人被假定是“有理性的”（rational），即其行为是经过选择的，旨在根据个人的效用功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它假定个人在行为过程中是能够对可能的选择进行比较的，即可以根据其所受到的限制来进行边际调整；强调研究的精确性和正规性，即所研究的命题要能够经得住经济计量或政治计量的检验。在研究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时，公共选择范式中最经常使用的概念有“公共商品”、“搭便车”、“政治商业周期”、“相互依赖”等等。

公共选择模式在西方国际问题研究中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因为它将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数理统计、博弈论、决策论等等，融合在一起，比纯粹经济学方法更能为诸多不完全了解经济学的人们所接受。正如瑞士学者布鲁诺·弗雷所指出的，这种方法的长处在于：第一，它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阐明一般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的某些特定问题；第二，由于它是建立在明确的和统一的人类行为理论的基础上的，因而能够提供一种得以产生理论解决和经验检验的工具；第三，由于它具有高度抽象性的特点，使人们可以分离和分析那些看起来相对简单的问题领域；第四，由于它要求进行经济计量和政治计量，所以它迫使研究者面对现实；第五，由于它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使得我们可以运用一种单一的理论方法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结合在一起。当然，由于它只适用于国际问题研究的某些特定领域，有可能出现片面追求规范性和精确性、过分拘泥于形式主义的危险。①

（6）比较政治经济方法。比较研究是与“方法论”比较贴近的一个领域，因为它所涉及的是“如何”进行分析，而不在乎分析的“具体内容”。根据利普哈特的观点，比较方法是一种建立普遍经验命题的基本方法，其他的方法还有实验方法、统计方法和个案研究方法。首先，它是一种“方法”；其次，它是“一种基本科学的方法”；再次，它是一种“在变量之间发现经验性联系的方法”；最

① 参见［瑞士布鲁诺·弗雷：《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Bruno Frey: The Public Choice 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载《国际组织》，第 38 卷，119～223 页，1984年冬季号

后，它是一种“宽泛的、一般的方法，而不是狭窄的、专门化的技术”①。

在政治科学中，比较政治是众所周知的，从事这类研究的主要是政治学家；比较经济在西方也很流行，不同的是在从事比较经济研究的学者中，除了经济学家外，还有许多政治学家。70 年代以后，随着“新政治经济学”的盛行，一些学者开始进行比较政治经济的研究，其中的先驱人物就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查尔斯·林德布洛姆。他从政治（权威、国家）—交换（市场）—民主—说服（意识形态）的几个层面及其相互作用，对世界上的各种不同政治经济制度本身和相互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探究政治—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林德布洛姆的研究范式被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广泛接受，运用来对国际政治经济进行比较研究。其研究的重点是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运行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在国际政治经济中，人们经常谈论东西、南北、南南、北北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问题。比较政治经济分析认为这还远远不够，还不能完全说明国际冲突与合作的全部问题。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类型、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发展中国家错综复杂的差异对各个国家的对外政治经济行为都是具有重要影响的。

第二节　国际政治学的形成与发展

一、国际政治学形成的历史条件

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是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世纪风云的产儿”。

国际社会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而逐渐形成的。在古代社会和中世纪，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在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各国家、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交往，因封建割据和封锁闭塞而表现为偶然的或单向的状态，并受到交通工具和信息传递手段的限制。古代中国曾经有过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古代的海上和陆上的“丝绸之路”也曾对沟通东西方的经济、文化关系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都不可能是普遍的和全球范围内的事情。在当时，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因而也不可能有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

① ［美］阿伦·利普哈特：《比较政治与比较方法》（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Comparative Method），载《美国政治学评论》，第 65 卷，1971（9）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确立和发展，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国际分工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把世界各国从经济上联结成为一体，使得彼此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不断加深，从而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构成了当今世界的国际政治社会。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这种国际关系既包括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还有资本主义国家与封建专制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有的是自由竞争、相互争夺的关系，有的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有的是谁战胜谁、你死我活的尖锐斗争关系。它们主要表现为经济关系，同时也表现为政治关系，并时而表现为军事关系，即诉诸武力，进行战争。作为这个时期国际关系的理论表现，产生了最初的一些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学说。它们散见于哲学、历史学、法学、地理学和政治学的著述中，既不完整，也不成熟，当然更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这决不等于这些学说不重要。无论是西方的政治思想家，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对以后的国际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积极的贡献，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9 世纪中后期对国际政治问题所做的论述，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珍贵的精神财富。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垄断逐渐取代自由竞争而占据统治地位，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为攫取高额的垄断利润而在经济上和领土上将世界瓜分完毕，同时，也使整个世界形成为经济和政治上的整体，形成了统一的资本主义全球国际关系体系。这个时期，国际关系的最主要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对整个世界的统治与垄断，这种统治和垄断渗透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无不处在资本主义大国的势力范围之中。国际关系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学说的发展。继传统的“均势”理论之后，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地缘政治学、战争与和平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都有了很大发展，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开始出现相对独立的国际政治学科。

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于 20 世纪 20 年代，这是现在国际社会比较一致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在西方国家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步形成了较为专门和系统的国际政治教科书和理论著作。国际政治学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成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是与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风云变幻和激烈斗争紧密相连的，特别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性战争，先后有五大洲的 30 个国

家参战，7 400万士兵投入战争，整个战争历时 4 年，死伤和失踪 3 500 万人，双方军费总额达 2 700 多亿美元。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而且极大地冲击了近代史上长期形成的欧洲中心地位。同时，在大战期间爆发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体系中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这一切，都对国际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对各国的政治家和思想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引起了人们的深刻反思：世界向何处去？如何避免人类再遭世界战争的浩劫？如何实现并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了当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学。

二、国际政治学的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学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但是它的思想理论渊源可以追溯至古代，特别是近代。在古代中国思想家的著述中，孙子曾说过：国无常友，亦无常敌。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诸多思想家的论著中，也都曾经涉及到国家对外关系问题。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西塞罗的《共和国》等等。中世纪是西方神权统治的黑暗时期，但在有关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方面的思想在许多思想家的著述中仍到处可见。例如，神权政治论者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法理论，但丁·亚利基利的世界帝国论，马西列的《和平的保卫者》，以及《格拉提安教令集》等等。当然，在古代和中世纪，由于政治学、外交学和国际法学本身尚不完整，因而对于国际关系的论述就显得更加零散，但对后人的影响仍不可低估。

15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也不断发展，在 17 世纪至 18 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出现了繁荣，并走向成熟。在各个相关的学科中，国家间关系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并且在一些学科中出现了较为系统地论及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学说，从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从思想史的发展角度看，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学科：

（1）哲学。哲学是社会科学中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在东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人性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代哲学家都从人性的“善”或“恶”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家、法律思想家，同时也都是著名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思想，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性之“善”与“恶”的论述，不仅为以后的国际政治理论家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而且直接影响到后人的一些基本的国际关系理论观点，如弗兰西斯·培根的唯物主义经验论、托马斯·霍布斯的机械唯物论、约翰·洛克的“自然

权利”和“社会契约”理论、孟德斯鸠的“自然神论”、让·卢梭的“天赋人权”和“人类理性”论，以及康德的“道德法则”等。

（2）政治学。国际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受政治学的影响最为直接。从思想史的发展轨迹看，对国际政治研究影响最深远的是尼科洛·马基雅弗利最先提出，后来为托马斯·霍布斯加以系统化的“自然状态”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与国内社会的有秩序状态不同，国际社会从未摆脱过自然状态，既没有秩序，也没有权威，相互猜疑，彼此竞争。在任何时候，国王和掌握主权的人们，由于他们是独立的，因而处于不断猜疑之中，常常摆出斗士的架势。他们的武器互相瞄准，眼睛盯着对方，总是想着如何在他们的王国的边界安设堡垒、武库和枪炮；他们还不断派遣特务到邻国。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战争状态。此外，政治学说中的国家主权理论，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理论，以及国家意志论、社会有机体论、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等等，都对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重要的影响。

（3）世界史学。世界史学对世界历史中具体史实的研究，大量涉及到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而且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本身，就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均势理论最早就是由意大利史学家伯纳多·鲁塞莱在分析意大利北部的若干城邦国家的相互关系中首先提出来的，并为以后研究世界历史的学者们广泛应用，成为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经典理论。在几乎所有国家，最早涉猎国际政治理论的学者，大多都是从研究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起步的。

（4）国际法学。国际法是调整国家间相互关系，规定其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原则和制度的总和，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直接相关。国际法学自近代以后逐步完善，先于国际政治学而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国际法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主要著述，是国际政治学最直接的理论渊源之一。主权平等原则、互不侵犯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等国际法的基本准则，都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内容。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普芬道夫的《自然法和国际法》，宾刻舒克的《海上主权论》、瓦尔泰的《国际法》以及边沁的《道德和立法原则》等著作，都对以后的国际政治学家具有深远的影响。

（5）地理学。地理学与政治学的结合，早在古代就已出现，近代以后，随着政治学的发展，出现了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其中最著名的有德国学者拉采尔，著有《人文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美国政治地理研究》和《生存空间论》；美国战略学家马汉及其《海军战略论》；英国学者麦金德及其《历史的地理枢纽》和《地缘政治论》等。地缘政治学从国家的地理状况，以及不同的地理空间和位置的角度，论及了不同国家所应采取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在国际政

学形成以后，它实际上成了国际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

(6) 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起源于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重商主义。17 世纪后出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使政治经济学发展到鼎盛阶段。19 世纪后期，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逐步走向衰亡，被纯粹经济学所取代，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将其应用于对国际问题的研究，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济互动，并且为后来国际政治学中的现实主义理论、新现实主义理论，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上述诸学科对国际政治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但是这些学说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国际政治学也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

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国际政治学，特别是对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奠定了基本的哲学基础，而且对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也具有重要影响。英国学者巴勒克拉夫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惟一基础"，是"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惟一的历史科学'①。"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的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赞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②其次，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学说，以及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的学说，对后来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具有重要影响。琼·斯佩罗在其《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中指出："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从 17 世纪的重商主义者到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国家间关系时都曾涉及过，但是在 20 世纪，这方面的研究却被忽视了。政治与经济彼此割裂，即使不是在实际上，至少是在国际关系的分析和研究中被孤立了起来。""造成这种割裂的原因，可以从当代西方理论遗产中找到，这就是自由主义。"③ 再次，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对此，大多数西方学者都予以肯定。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肯尼思·沃尔兹在其《人、国家与

① ② ［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26、261 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③ ［美］琼·斯佩罗：《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Joen Spero: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1 页，纽约，圣马丁出版公司，198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